

2 罗仁地先生意义创造论导读

杨旭

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内容摘要 罗仁地先生提出“意义创造论”，强调语言是一种动态行为，属于交际和整体人类行为的一部分。其核心观点认为，人类通过溯因推理在解读的环境中创造意义，这一过程主观且不完备，但却是生存本能的体现。罗先生认为，交际行为是示意与推理的格式塔，语言仅是制约推理的工具，而非唯一方式。他还主张语言是一种文化习俗，反映并影响认知与文化，具有动态性和惯性。语言差异源于环境、社区和文化接触，研究应采取整合主义方法，结合跨学科、归纳法和实际语料，避免结构主义框架。

意义之创造，创造于头脑。

(The Creation of Meaning: It's All in Your Head.)

——罗仁地 (Randy J. LaPolla)

罗仁地教授是一位奇妙的先生，面对他著作等身的成果，你会遇到范畴化的问题。罗先生在自己的个人网页上，提供了两种分类法：一种是按照体裁，包括书籍、专刊、论文、报纸文章等；一种是按照语言和话题，包括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汉语、独龙语和日旺语、羌语、他加禄语、人工智能、语用学与语言发展、语言类型学与田野调查、社会语言学、历史语言学、他人访谈自己、自己访谈他人等。这些洋洋洒洒的成果，拼凑出的是怎样一个罗先生呢？

罗先生是汉藏语专家，师从东亚和东南亚语言权威詹姆斯·马提索夫 (James A. Matisoff) 先生，考察过上面提到过的诸种语言；他熟悉英语和汉语普通话及其方言，能够阅读法语和日语文献，还接受过两年的古藏文训练；正是在熟悉这些语言的基础上，他在语音学、形态学、句法学、词汇学、语义学、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等领域皆有精深见解。

他懂各种研究方法，做过田野调查，足迹遍及美国、菲律宾、中国（如北京、上海、台湾、香港、湖南、四川、福建、云南）等（罗仁地 2007；罗仁地、卢琳 2024）；做过心理学实验，如通过实验方法讨论了现代汉语的语音象征性问题（LaPolla 1994）；做过神经

杨旭. 2025. 罗仁地先生意义创造论导读. 黄成龙、杨旭（主编）《意义创造论：罗仁地先生七秩寿庆文集》，pp. 20–30.

科学实验，试图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和脑电图仪（EEG）技术，来研究溯因推理在大脑中的表征（罗仁地 2023a）。

他精通很多新兴的理论，如角色-指称语法、信息结构理论、构式语法、语法化学说、互动语言学等；也掌握很多经典的理论，如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如布拉格学派）、系统功能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等；他也很懂非语言学的知识，在研究和教学中体现出跨学科性，比如罗先生曾说他的理论也考虑到给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领域去参考，他所指导的博士生、博士后分布于中文系、哲学系、教育系、心理学系和社会学系等。

罗先生是如何把这些貌似差别很大的理论或领域熔铸在一起的？这就不得不提罗先生的意义创造论了。意义创造论的英文是 *The Creation of Meaning*，从这个名字本身就可以看出，这不是只关注语言的理论，而是从更大的视角出发的。何谓“意义”？我之前问过 AI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想知道的是“人生”这个词的语义，但因为“人生的意义”这个表达已经“习俗化”了，它们给出的永远是哲学角度的回答。罗先生关注的就是这个更大的“意义”。

接下来，我将对罗先生的理论进行导读，主要基于这几篇文章：罗仁地（2017、2022、2023a）、罗仁地、潘露莉（2002）、LaPolla（2003、2015）。这几篇文章有重合之处，但各有侧重，如果非要推荐一两篇的话，我个人推荐罗仁地、潘露莉（2002）和 LaPolla（2015）。这篇导读的目的是在整理罗先生观点的基础上，帮助大家理清意义创造论之构建逻辑，带大家了解其纷繁复杂与内在统一；间或有我个人的点评，但不多，还是推荐大家去阅读原文。

一、世界因溯因推理而获得意义

意义创造论的核心主张是：人类为了在自然界中生存下去，需要了解周遭发生的事情，需要了解我们如何与之互动，需要了解如何免于环境之伤害；这种了解即是在创造意义，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本能。表面看来，这一核心主张没有谈及语言，但其实处处都在谈及语言，因为罗先生不仅把语言和非语言行为考虑在内，而且把整体的交流行为与非交流行为都考虑在内，关心的是人类与整个大自然（包括与同类）之间的互动，而研究这种人类行为正是罗先生真正感兴趣的所在。

那么人类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通过思维或者推理。罗先生每次阐述意义创造论，都要把推理的知识先讲一遍（三者的定义、特征和案例见表 1），而且特意强调了溯因推理相对于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溯因推理在意义创造论中具有基础地位，因为意义创造的主要推理方式是溯因推测。人类在与世界互动的过程中，把那些最相关的事实或假设整合在一起，这既包括人类感知到的周围环境，也包括大脑里边激活的内在环境，从而创造出一种“解读的环境”（*context of interpretation*）；¹在这个环境中，

¹ 可以看出，“环境”是一种认知或心理现象（Ungerer & Schmid 2006: 48）。

人类对某现象做出解释或提出假设，从而创造了意义。我们无法脱离这种解读环境进行推理，比如在判断那些脱离环境的词语的意义时，我们会无意识地创造出一种环境。

表 1 推理类型

类型	子类	定义	特征	例子
确定推理	演绎	从一般前提出发，通过演绎得出具体陈述或个别结论	前提真实保证结论真实	所有人都会死。（前提） 苏格拉底是人。（前提） 苏格拉底会死。（结论）
不确定推理	归纳	对一组数据进行概括，获得一般结论	前提真实只能保证结论可能真实	我见到的天鹅都是黑的。（数据） 天鹅是黑的。（结论）
	溯因	针对某种现象提出原因（即因果推理）		有人拿着一把刀向我走来。（现象） 他是要过来给我切苹果。（解释）

遗憾的是，大家忽视了溯因推理，包括人工智能专家。罗先生说：“了解溯因推理法的功能和运用对科技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到目前为止，专做科技的学者甚至没有广泛认识到溯因推理法在下一步行动中的重要性，而这正是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可以帮忙的地方。”（罗仁地 2023b）受罗先生启发，我在“认知语言学”课上讲到“语言决策”，也会特别地讨论到溯因推理法，并且概括了它的三个特征：（1）社会性，溯因推理属于社会推理，会激活用于心智解读的脑区；（2）概率性或主观性，因为意义的创造经常需要快速做出，所以整合的事实或假设必然是不完备的，所得结果也只能是大概率准确的；（3）自动性，即溯因推理经常是一种自动化加工，属于社会心理学所说的直觉思维（gut feeling, Gigerenzer 2007）或者系统 1/快思考（System 1, Kahneman 2011）。

对溯因推理的一个误解是，它只是“溯因”，即由果及因，不包括由因及果。但事实上，二者是统一在一起的。罗先生指出，由因及果即预测，是溯因推理的一种应用。举到的例子包括：开车的时候看到前面的车好像偏左，可以推测是因为他要换车道；黑云出现是因为水汽聚集，预测会下雨。好比我们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知兴替当然可以指导我们创造未来。当然，这种预测更像是预估，即我们无法做到真正的预言。具体到人际互动，我们通过溯因推理来理解同类行为（如动因、意图），也预测同类可能做出哪种行为（如帮助或伤害），这不过是普遍生存本能的一种应用；当我们理解了同类试图让我们了解其意图的意图，那么就具备交流的基础了。

二、交流是示意和推理的格式塔

交流涉及发起者和回应者二重角色，发起者做出示意行为，让对方明白自己想要就某些事情进行交流；回应者对之进行推断，得出示意行为背后的意图是交流。发起者在做出示意行为时，也在推断回应者的理解能力，然后采用最有可能帮助对方理解的示意行为。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在文学和幽默中，发起者的目的是对回应者的理解稍加阻碍，让对方付出更多的认知劳动以获取答案，因为我们人类有一种从推理中获得快乐的本能。罗先生关于文学和幽默的观点，让我对正在思考的修辞本质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我之前认为修辞和“元语言功能”密切相关，但是罗先生的观点启发我：我们之所以喜爱语言文字游戏，乃植根于我们喜爱推理的游戏本能（杨旭 2025）。

在罗先生看来，交流包括语言和非语言行为，是一个很难把二者截然分开的格式塔。他常举到的例子是上课点名：在课堂开始时，老师叫到“Alan”（艾伦），有一个学生指着艾伦的空位，说“厕所”。在这个交流行为中，学生知道老师叫人名字是在点名，而不是“称谓”；老师则根据语言线索“厕所”、非语言线索手势以及上厕所的百科文化知识等，推断艾伦到了，只是临时去了厕所，所以不应该标记为缺席。罗先生还举到纯视觉的例子，比如图 1，由爱尔兰风格的图案构成，虽然形式较为陌生，但人们仍能推断出 Google；再比如图 2，不同视角会得出不同的字母。罗先生想通过这些例子说明：我们创造出什么样的意义，取决于我们的固有观念、我们认为重要/突显的东西，以及我们本身的视角。



图 1



图 2

语言和非语言行为没有太大差别，都是服务于交流格式塔的。罗先生给了神经科学的证据：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表明，语言和非语言交流的处理位于大脑同一区域，包括被称为“布罗卡区”和“维尼克区”的区域。罗先生进一步假设，如果我们设计一个心理学实验，来验证语言交流是否特殊，那么会发现语言与非语言交流并无差别。这也与认知语言学所强调的领域通用（domain-general）认知能力的观点相一致：即没有专门用来处理语言的认知能力，用于处理语言的认知能力也在其他认知领域中发挥作用，语言不过是诸多领域通用认知能力的延伸。我有一门叫作“语言与符号”的课，会讲到姓名、脏话、唱歌、表情符号（Emoji）这些不被视为语言的例子，我发现通过这种交流格式塔的视角，学生更容易对语言学产生兴趣。

在交流行为的格式塔中，语言和非语言的角色并列，都是用来制约对交流意图的解读的，只不过语言更为明确或精细，即“非语言交流和语言交流之间的区别是工具或方式的区别，进而导致精度的差异，就像手撕面包和刀切面包的区别一样”（LaPolla 2021）。需要注意的是，明确或精细是相对的，比如英语“I have had lunch”（午饭已经吃了）和“I have been to the mainland”（我到过大陆），都使用了强制的过去完成标记，制约得已经足够明确（我们不可能理解为现在或未来），但是过去是多久，只有结合环境才能知道：前者是发生在一个小时左右，后者是发生在更久的过去。更典型的例子是：我们会字斟句酌地制定法律，目的是明确，但仍然需要法院或法官来解读法律，这也给了坏人在法律灰色地带游走的可乘之机。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罗先生提出“一切都是语用学（It is all pragmatics）”这一在很多人看来有些激进的说法。既然一切都是语用，那么与意义创造的主观性一样，交流行为也具有不确定性。交流不像过去认为的，是一种编码和解码的过程，做不到像邮寄包裹一样，邮寄的是什么，接收到的就是什么。交流主要基于具有概率性的溯因推理，其中语言相对于非语言固然提供了更多的制约，但永远不可能做到百

分之百制约。²我从罗先生的论述中领会到了辩证法：人类交流既体现出理性，因为合作原则的核心即是假设人是理性的；也体现出非理性，因为意义创造具有主观性，交流行为具有不确定性。

三、语言是一套涌现出的文化习俗

2019年，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学，我的合作导师林静夏老师推荐我去听罗先生的课。说实话，我当时没怎么听说过罗先生，因此并没有要去见大师的那种兴奋。只用了一节课，罗先生便征服了我，听他讲“语言何以不同、为何不同”（HOW & WHY LANGUAGES DIFFER），我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抛开人格魅力不谈，这种一见如故很大程度上是由语言观决定的，因为我们都信奉：语言是一个动态的复杂适应系统。我在读硕士研究生时，就已经跟随王仁强老师学习了相关理论，还翻译了两篇论文（杨旭、王仁强 译 2015；王仁强、杨旭、李娜 译 2018）。在新加坡听罗先生讲课，我又找到了一位知己。

还是拿路的例子来说明比较好——这也是复杂科学和罗先生最常用到的例子——但不是类似于柏油路那样的路，而是草坪里面众人踩出来的路，英文叫作“欲望之路”（desire path）、“牛道”（cow path）或“羊道”（goat track）。人们在穿越草坪时，没有人想着要创造一条路，只是想着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即捷径）；一开始也只是踩踏的痕迹，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后，量变发生质变，一条路就“涌现”出来了，或者被人们识别出来了。这让我对鲁迅的名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有了不同的认识。语言就像这条路，在前语言时代，没有人想着要发明一门语言，³但是当很多人尝试与同类沟通或互动时，语言便慢慢地形成了。这种形成没有目的或方向，而且永远不会停止，因此语言不是静态的事物，而是动态的演变，我们所看到的静态的词典、语法书，不过是动态演变的一个快照，语言唯一不变的是变异和变化。

罗先生认为，语言就像烹饪/饮食或者穿衣一样，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习俗，其功能在于制约人类交流中的解读环境；所谓语言知识或规则，不过是我们以前如何使用词语和结构以达到某种目的的经验。既然是文化，那么就可以施行“拿来主义”。罗先生举到的例子是英文中的 *gungho*（“有极大的精神或热情”），来自中文“工合”（“工业合作社”），英文“拿来”之后便完全按照自己的文化来使用。好比东南亚虽然“拿来”了西方的叉子和勺子，但是使用的方式却非常不同。这些例子显示了语言和非语言文化之间的类似。

²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罗先生为什么要用“制约”这个词，即是从反面来排除歧义的，或者说缩小可供推测的范围，而不是从正面促进“解码”得到语言中“编码”的意义的。

³ 当然，在语言诞生之后，人们具备了独立创造一门语言的能力，比如历史上有很多尝试创造世界通用语言的实践（如世界语），如今为影视剧创造的人造语言也是非常多（如克林贡语）。

语言既然是文化，那么也具有惯性特征。罗先生都是从个人角度论述这个特征的，但我认为应该区分一下个人习惯和集体习惯：个人在习得语言之后便形成习惯，比如把某些语音归为同一个音位，而把其他语音视为其他音位，在学习第二语言时想改变这种习惯非常之难，因此口音是很难避免的；集体在涌现出语言之后也表现出惯性，即语言虽然一直处于动态演变中，但不是极速或动荡的演变，否则很难作为一种有效的交流工具，与之前强调的语言之“变”相比，集体语言又表现出稳定性或一致性。

把语言视为一种文化，就不得不谈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了，这是“语言与思维”领域所关心的话题。罗先生一直重视浪漫主义传统（LaPolla 2020），因此对语言与文化或思维的关系多有论述：

人们的文化和认知（例如，人们如何描述事件）会影响语言，但是一旦成为语言中的惯例，就会传递给后代，并且会影响人们如何思考这些事情。……语言编码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同时也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因为我们从祖先那里学习了这些概念）。（LaPolla 2015）

看得出，罗先生基本上是主张一种互相影响的关系。首先，语言反映出人们的文化和认知构建。以中文和英文对比为例（来自罗仁地 2017），“汤”和 soup，“南瓜”和 pumpkin、squash，“有”“在”和 have，它们之间没有绝对的一一对应关系，因为不同语言反映了不同社群的认知范畴。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反映”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而消失，罗先生举了非语言的例子，比如戴领带、在英国喝茶前倒牛奶、公路上的拟人交警；也举了很多语言的例子，比如“回车键”（carriage return）的叫法来源于过去打字机纸架回位，“拨电话”（dial a phone）来源于过去的拨号盘，Goodbye 是对“God be with ye”的简化，这些例子都是过去自有其理据，但现在理据消失了，习俗化的行为留下了。

其次，语言也会影响人们的思维。《话镜》作者盖伊·多伊彻（Guy Deutscher）说，空间、性别和色彩是迄今为止最有说服力的展示语言对思维有影响的领域（Deutscher 2010: 236）。但对我而言，语言学家不举语言本身的例子是说不过去的，罗先生就用了语言本身的例子：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真的会把普通话中“北京”中的开头声音听为/b/，他们也不会听到普通话中四个声调之间的区别。此外还举了自身的例子：罗先生在美国长大，认为小虾、大虾和龙虾是三种非常不同的动物，因为它们在英文中有非常不同的名字（shrimp、prawns、lobsters），但是在中文里，它们都叫“虾”，只不过在大小上有所区别（“小虾、大虾和龙虾”）。

四、语言何以不同、为何不同？

前面讲过，我上过罗先生的一门课，叫作“语言何以不同、为何不同”。正是在这门课上，我体会到罗先生对一门具体的语言，可以了解得有多么细微。当我们阅读罗先生的理论文章时，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哲学家；但是当我们阅读他的案例文章时，我们发现他是一个跋山涉水做过很多田野调查的科学家。

语言何以不同？关键词还是“制约”：语言之间的差异不在于能表达或能理解什么，而是必须表达或必须理解什么；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历史，因重复使用而发生习俗化之后，会选择对那门语言使用者来说最重要的概念领域进行制约。罗先生把这种“制约”呈现为3条公式，三者之间呈现递进关系（更多的例子参 LaPolla 2003）：

（1）语言是否制约对某一特定概念领域的理解？比如，汉语没有标记时的结构，而英语有好几种标记时的结构。

（2）如果制约了某一特定概念领域的理解，那么程度如何？比如英语将来时的解读分为过去、现在、未来，而日语分为过去和非过去，日旺语（缅甸克钦邦）分为非过去时和四种程度的过去时（取决于事件发生在过去多长时间）。

（3）如果制约了某一特定概念领域的理解，那么是如何制约的？比如说：一个说英语的人想说 *He is washing his hair*，必须用一个领属结构来制约对头发所有者的识别。在同样的情况下，日旺语也需要制约头发所有者的身份，但使用的是反身语和中动结构。

在这个框架下，罗先生对语言差异提出更理智的看法：不能简单地说某种语言的语法化程度更高或对解读的制约更强，只能说某些语言在特定概念领域（如时态、共指）上选择了更强的制约，而在其他领域可能更为开放。这种多样性揭示了语言适应不同文化、认知和环境需求的灵活性。

至于语言为何不同，罗先生认为，语言的差异源于环境、社区规模、认知模式和文化接触的共同作用。语言不是静止的，而是通过无数个体的反复互动和适应逐渐演变的“无形之手”的产物。其结构和词汇反映了说话者如何理解世界，以及他们面临的沟通需求。尽管某些语言特征的最初动机可能不再明显，但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历史和文化适应的证据（详参 LaPolla 2003）。

五、倡导整合主义的研究方法

罗先生倡导过很多种研究方法：

跨学科研究。既然语言本质上不是一种固化的形式，而是灵活的文化行为、交流行为，那么语言学就是一门行为科学，所有有关行为的科学都跟语言学有密切关系，都是一体的（罗仁地 2017）。这也是为何罗先生会在“2021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交叉学科前沿论坛”的演讲中说：“我的研究领域是语言学，……但是，当有人问我做什么样的研究的时候，我说我研究人类行为和认知。”（罗仁地 2023a）

归纳式方法。罗先生说，语言研究应基于真实语料，观察重复模式及其功能，依语言自身特性定义其范畴，而不是先入为主地把所谓跨语言范畴套用到未描述的语言身上，这样才能摆脱掉印欧语系或汉语框架的影响，确保每种语言的分析独立、客观，揭示其现象多样性（杨旭、卢琳 2021；罗仁地 2022）。罗先生呼应了石锋先生和李宇明先生（石锋 2025），倡议：“新时代的语言学研究，要着重以人为中心，呼吁大家走向社会！走向田野！走向实验室！走向互联网！”（罗仁地 2023a）

不区分共时和历时。罗先生指出，21 世纪的语言学研究观点认为，语言并非固定体系，也无“共时”与“历时”之别，而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不断涌现。这种视角拓宽了语言学研究范围，将研究对象扩展至所有交际行为，包括非语言交际和动物交际，而不仅仅局限于脱离语境的语言形式（罗仁地 2017；罗仁地 2024）。

具体的提倡还有很多，如果要一言以蔽之的话，那就是“整合主义”。罗先生把他所主张或认同的理论称为“非结构主义”或基于使用（usage-based）的方法，包括意义创造论、整合语言学（Integrational Linguistics）、极点构式语法（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等。与结构主义的还原主义、成分主义和分布主义相比，整合主义以实际的言语单位（语调单位、构式）为基本单位，并从交际互动的格式塔来看待言语行为，不仅包括语境和语调，还包括手势、眼神以及交际互动的其他方面（罗仁地 2022）。

罗先生的方法论是如何形成的？你可以说罗先生之所以提倡这样的方法论，是因为抱有前述认识论；但也可以说，是因为罗先生按照这样的方法论来展开研究，才形成了前述认识论。这种循环因果也体现在罗先生的论述里边：

语言是一种社会性现象，是一种复杂自适应系统，是很多人进行交际时涌现出来的副产品。没有一种简单的方法能够解释其所以然。20 世纪时由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影响，有不少人认为在研究语言的时候，可以脱离人类行为和认知的有关方面而单独研究语言的形式，但这种研究方法并没有带给我们有用的结果，由此可见，我们需要从交际互动的格式塔（完形）以及影响交际互动发生和运作的因素进行研究。

.....

遵循以上讨论的融合性方法，我对交际的本质以及语言的作用和本质有了新的理解，而这种新的理解与传统的看法很不一样：我了解到交际不是像电脑一样通过编码和解码进行的，交际的关键机制是溯因推理法，就是推测对方做出交际行为的目的。（罗仁地 2023a）

最后做个总结吧。我想说，罗先生不单单是一个语言学家，而是一个富有人文主义精神的科学家。也许正是这种人文精神，才是我特别喜爱罗先生的深层原因。我现在正在武汉大学代“人文社科经典导引”的通识课程，讲述仁爱、理性、正义、生死、爱恨、审美、悟性这些貌似很抽象的话题。这不是一门语言学的课，但我在课上也常引用罗先生的观点。比如讲到生死问题时，我会引用罗先生跟我们说过的，人生没有什么意义，是我们为

之赋予的意义，追求爱与被爱是意义之一种。尤其是在第一课，我在讲为何要设置人文通识课程时，会引用到罗先生那篇常读常新的演讲。所以，这篇文章以罗先生的引文开头，最后还是以罗先生的原话结束吧：

人类如果不想被机器取代，就必须回到使我们成为人的本能（get back to what makes us human）。这包括合作学习、创造力、批判性思维 and 同理心——而这些正是与艺术和人文教育相关的技能。……。人文学科的伟大作品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们拥有一种明显但难以捉摸的能力，照亮我们共同的人性，照亮不同历史情况下的不同人的生活。这些作品以某种方式超越了自己创造的条件——针对其时代说话，但也超越其时代。（罗仁地 2023a）

参考文献

- 罗仁地 2007 语言类型学/功能语言学派视野下的语言学田野调查，《语言学论丛》第 36 辑。
- 罗仁地 2017 尊重语言事实 提倡科学方法——21 世纪语言学刍议，《光明日报》2017 年 12 月 03 日 12 版。
- 罗仁地 2022 非结构主义语言学，《实验语言学》第 3 期。
- 罗仁地 2023a 以人为中心：交叉研究的必然走向，《语言战略研究》第 3 期。
- 罗仁地 2023b 人工智能要考虑到溯因推理，《长江学术》第 4 期。
- 罗仁地 2024 动物交际的机制，“实验语言学+云上论坛”，2024 年 03 月 26 日，南开大学（线上）。<https://mp.weixin.qq.com/s/obopPfSRuHIPS-HVdc8rNg>
- 罗仁地、卢琳 2024 21 世纪的田野调查——基于自然语料、归纳法和目的语母语人的认知范畴，《语言学论丛》第 4 期。
- 罗仁地、潘露莉 2002 信息传达的性质与语言的本质和语言的发展，《中国语文》第 3 期。
- 石 锋 2025 王士元之问——AI 与人类习得语言的方式如何不同，微信公众号“今日语言学”，2025 年 01 月 23 日。https://mp.weixin.qq.com/s/JQFbbARW_Fh6bFKB-6ujBA
- 王仁强、杨旭、李娜 译 2018 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自然语言，《英语研究》第 1 期:133-142。
- 杨旭 2024 一项宣言：语言是平的，微信公众号“摩登语言学”，2024 年 12 月 3 日。<https://mp.weixin.qq.com/s/FzmR3lflkkGEqglMYgnAA>
- 杨旭 2025 构式网络视角的汉语修辞研究，“构式网络与语法修辞”扁平工作坊，2025 年 03 月 29-30 日，中国·武汉，武汉大学。
- 杨旭、卢琳 2021 从功能视角看汉语研究若干问题——著名语言学家罗仁地访谈录，《南开语言学刊》第 1 期。
- 杨旭、王仁强 译 2015 语言乃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立场论文，《英语研究》第 2 期。

- Deutscher, Guy. 2010. *Through the Language Glass: Why the World Looks Different in other Languages*. Metropolitan books.
- Gigerenzer, Gerd. 2007. *Gut Feelings: The Intelligence of the Unconscious*. Penguin.
- Kahneman, Daniel. 2011. *Thinking, Fast and Slow*.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LaPolla, Randy J. 2003. Why languages differ: Variation in the conventionalisation of constraints on inference. In David Bradley, Randy J. LaPolla, Boyd Michailovsky & Graham Thurgood (eds.), *Language variation: Papers on variation and change in the Sinosphere and in the Indosphere in honour of James A. Matisoff*. Pacific Linguistics.
- LaPolla, Randy J. 1994.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into sound symbolism as it relates to Mandarin Chinese. In Leanne Hinton, Johanna Nichols & John Ohala (eds.), *Sound Symbolism*, 130–14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中译版：杨旭译 2023 现代汉语的语音象征性，《实验语言学》第2期。
<https://mp.weixin.qq.com/s/VFYrq5dJFytvylicl2UqJA>
- LaPolla, Randy J. 2015. On the logical necessity of a cultural and cognitive connection for the origin of all aspects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In Rik De Busser & Randy J. LaPolla (eds.), *Language 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 31–44. John Benjamins. 中译版：杨旭译 2022 语言结构与文化、认知的逻辑必然联系。
<https://mp.weixin.qq.com/s/SUqUFW8InuW1Atgania9dg>
- LaPolla, Randy J. 2020. Forward to the past: Modernizing linguistic typology by returning to its roots. *Asi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1(1): 147–167. 中译版：杨旭译 2022 追根溯源、鉴古知今——实现语言类型学的现代化。<https://mp.weixin.qq.com/s/3XDviv7-ooIJBmXhpog40A>
- LaPolla, Randy J. 2021. The Creation of Meaning, 05-21-2021, University of Sydney.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B4y1T7Qa/?from=search&seid=7579837679880514828&spm_id_from=333.337.0.0&vd_source=cc2dffce0723096c58949c3055dabe58
- Ungerer, Friedrich & Schmid, Hans-Jorg. 2006.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2nd ed.). Routledge.